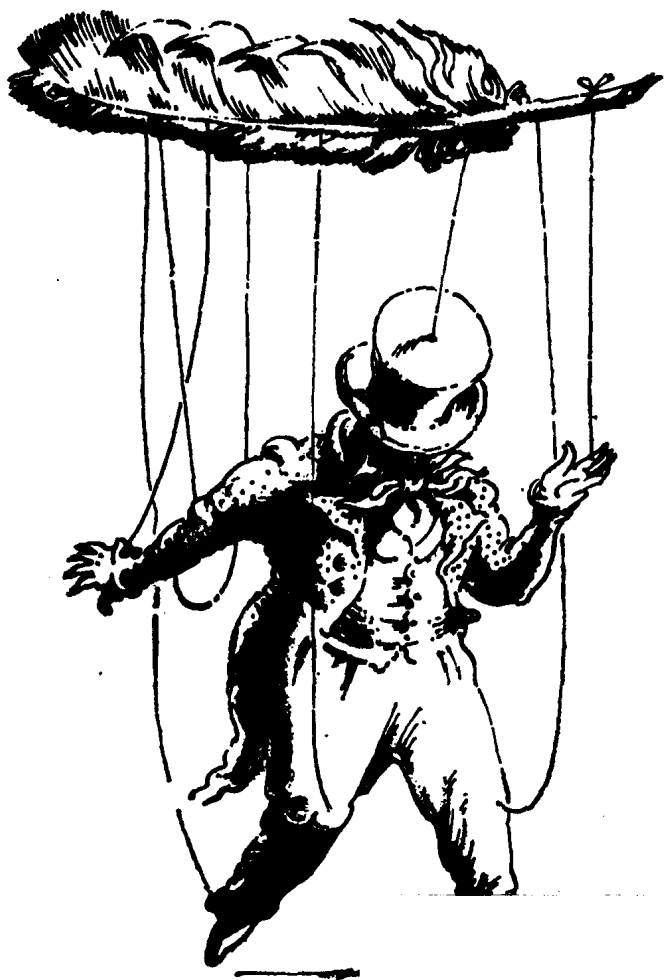


死农奴

〔俄〕果戈理著 陈殿兴 刘广琦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Н. В. ГОГОЛЬ
МЁРТВЫЕ ДУШИ
(根据苏联作家出版社1983年版本译出)

死 农 奴

〔俄〕果戈理 著

陈殿兴 译

责任编辑：郭得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09,000

印数：1—14,000

ISBN 7—217—00176—5/I·84

统一书号：10109·2131 定价：3.00元

新书目：87—33

目 录

译 序.....	(1)
----------	-------

第 一 卷

第一章.....	(19)
第二章.....	(32)
第三章.....	(54)
第四章.....	(77)
第五章.....	(109)
第六章.....	(133)
第七章.....	(158)
第八章.....	(182)
第九章.....	(208)
第十章.....	(229)
第十一章.....	(249)

第 二 卷

第一章.....	(283)
第二章.....	(315)
第三章.....	(327)
第四章.....	(366)
最后几章中的一章.....	(387)

译 序

这部小说前人译为《死魂灵》，是俄罗斯文坛巨匠果戈理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也是近百年来在全世界拥有众多读者的世界古典名著之一。果戈理本人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都跟这部小说有密切关系。正如俄国文学批评大师别林斯基所说，“《死农奴》甚至使他自己在这之前所写的全部作品黯然失色，彻底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问题，巩固了新流派的胜利。”^①这部小说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我认为这部小说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当年伟大的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曾经期望有一天俄国的老百姓会从集市上买回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作品^②，我今天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读读果戈理这部天才的不朽著作。作为译者，我觉得自己的义务不仅是努力消除两种语言所造成的隔阂，使读者能得到跟原文读者大致一样的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而且也应当负责对自己倾注几年心血所译的这部世界名著作一个简明扼要、比较全面的介绍。我想读者拿到本书的时候，一定会问：果戈理为什么能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好吧，那就让我们从这里谈起吧。

①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VIII, стр. 10.

② 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谈到果戈理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时，一般都提到普希金给了他这样一个题材。我觉得这只是事情的起因，这个起因必须在一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基础上才能起作用。我们的问题不能不在果戈理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中去找答案。

果戈理1809年3月20日(新历4月1日)生于乌克兰。1821年入涅仁高等学堂^①读书，1828年毕业，去彼得堡。1829年发表《汉斯·古谢加顿》。1852年2月21日(新历3月4日)逝世。他的文学活动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进行的。

果戈理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的时代。那时俄国农奴制度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1812年的卫国战争击溃了拿破仑，使俄国人民打开了眼界，不愿再受农奴制的奴役。果戈理的青少年时代正赶上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为改革俄国社会而酝酿并举行起义的年代。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下去，俄国社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嗣后，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又有明显的发展。

这时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也风起云涌，方兴未艾。1830年发生了七月革命。三十年代英国发生了宪章运动(这次运动曾被列宁誉为“世界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

① 原文是 Гимназия высших наук князя Безбородко, 1821年初创办, 是当时第聂伯河东岸乌克兰地区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 学制为九年, 每三年为一级, 分初级、中级、高级。高级班分哲学、法学两科, 讲授大学课程。(见 Н. Л. Степанов, Н. В. Гоголь, Гос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стр. 17)。

命运动。”)。1848年发生了法国革命。西欧的革命运动对俄国农奴制社会的危机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风雨飘摇之中的沙皇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一方面加紧镇压进步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强化反动宣传。御用文人乌瓦罗夫之流炮制的所谓官方民族性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

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环境中，俄国知识界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在如何解决俄国社会矛盾问题上产生了几大政治派别。一派是西欧派，代表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地主的观点，主张俄国应走西欧的道路，反对农奴制，把发展科学和教育、普及知识看作是改变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认为只有逐步掌握西欧各国所积累的文化，采取西欧形成的各种生活方式才是社会变革唯一可行的方式。另一派是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贵族地主阶级利益，反对俄国走西欧发展的道路，幻想在农民同贵族、君主政体、正教教会之间维持一种封建宗法关系。果戈理有些过从甚密的朋友如谢维辽夫、波戈金、阿克萨科夫等便是属于这一派的。还有一派是刚刚形成的以别林斯基、赫尔岑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

在文学创作方面，当时浪漫主义尚风靡文坛，但现实主义已开始显露头角。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普希金发表了《叶甫盖尼·奥涅金》、《鲍里斯·戈都诺夫》、《上尉的女儿》等一系列现实主义宏篇巨制。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和莱蒙托夫的一些现实主义杰作如《当代英雄》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鸣锣开道的别林斯基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展活动的。

果戈理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进行创作活动的。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果戈理在涅仁高等学堂读书时就受到了一些进步教授的影响，在他们邻居卡普尼斯特家里也接触过一些思想进步的十二月党人。那时他就立志要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1827年，即他从涅仁高等学堂毕业的前一年，他在给舅舅科夏罗夫斯基的信中说过：“从很早以前，从几乎还不懂事的时候起，我心里就燃烧着一个不可熄灭的热望——就是要使自己的一生过得对造福国家有用，哪怕做出微小的贡献也好。一想到我可能做不到这点，可能有人来挡住我的道路，使我连一点点贡献也做不出来，我就深感忧虑。一想到我可能一事无成不能流芳后世，而将默默无闻了此一生，我的脸上就会冷汗滚滚，——人生在世而不能流芳后世——这对我来说是可怕的。我考虑过各种差事、各种职位，我选中了一种职业。那就是法律。我认为这方面可做的工作最多，只有在这方面我才能有所作为，只有在这方面我才能对人类真正有用。判案不公平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幸，使我最感痛心。我曾宣誓不使自己短暂的一生有一分钟不为造福人类而虚度过去。”^①涅仁高等学堂毕业后，他到了彼得堡，打算在司法界一显身手。冷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想。有很长时间他不得不靠家里的接济维持温饱。

1829年，果戈理发表了处女作——长诗《汉斯·古谢加顿》。果戈理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不是偶然的。他的父亲就是乌克兰一个有名的作家，曾写过几部喜剧，对果戈理很有影响。据斯捷潘诺夫说，果戈理后来写《索罗庆采市集》时曾引过他父

①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Гос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 т. VI, стр. 253.

亲喜剧中的话作为题词。^①他还曾想在彼得堡上演他父亲的剧本^②。他父母的邻居卡普尼斯特也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他常到卡普尼斯特家作客，也不能不受到影响。他从小就喜欢文学。在涅仁高等学堂读书时，他不仅对文学作品很感兴趣，而且还搜集了乌克兰民间故事、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大量资料，并尝试着写了许多作品。除一些短诗外，当时写的作品有故事诗《两个渔夫》、悲剧《强盗们》、中篇小说《特维尔季斯拉维奇兄弟》，不过这些作品都已散佚。

1831年，果戈理发表了成名作《狄康卡近乡夜话》。直到这时为止，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那样，果戈理一直处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之下，而且模仿的痕迹也极为明显。^③然而即使在写这些浪漫主义作品时，他也是取材于熟悉的生活资料。这从他不断写信要他母亲提供乌克兰各种习俗、服饰、器物、传说等各种资料中可以看出。正如他后来说的：“我从来不会在想象中创造出什么来，而且也没有这种本领。只有取材于现实、取材于我所熟悉的资料，我才能够表现得更好。”^④我认为，写作方法上的这个特点是他后来走上现实主义道路的很重要的主观条件。

1831年，果戈理认识了普希金，并结为好友。普希金在思想和创作上对果戈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果戈理自己也说普希金是第一个使他严肃看待作家事业的人。^⑤他还说：“我创作的时候眼前只看到普希金……我珍视他那永恒的不可违抗的教导。我所做的事，我所写的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听了他的劝告的。我身上

① Н. Л. Степанов, Н. В. Гоголь, стр. 12.

②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 соч.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т. VI, стр. 259

③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新文艺出版社版，第207—208页。

④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 соч.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т. VI, стр. 215.

⑤ Там же, стр. 207.

的一切好东西，莫不应当感谢他。我现在的这本书，也是他的创造。他要我发誓来写它。写任何一句话的时候，我眼前都看到他。想到他会满意，会喜欢，我就感到欣慰，这对我是最高最重要的奖赏。”^①正如高尔基所说，果戈理在普希金的指导之下创作了他的最好的作品。1834年发表了《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1835年出版了《小品集》和《密尔格拉得》。同年九月，别林斯基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一文中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果戈理为“奇才”，承认他是“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说“果戈理是诗人，现实生活的诗人”^②。在这些作品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开始形成，批判农奴制的倾向已显露出来。另外，果戈理的认识这时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在《作者自白》中说：“我看清了在我的作品中笑得没有意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要笑最好狠狠地笑那些真正值得人人加以嘲笑的东西。”凡此种种都为创作《钦差大臣》和《死农奴》准备好了各种必要条件。

三

《钦差大臣》的上演，给果戈理招来了反动阵营的猛烈攻击。写《死农奴》的时候，他清楚地认识到两种作家的两种命运。那些用醉人的烟雾迷住人们的眼睛、巧妙地阿谀人们、把生活中可悲的现象掩饰起来的作家将会被人们誉为举世无双的伟大诗人。而另一类作家的命运和遭遇则不同，“因为这类作家胆敢把每时每刻显现在人们眼前而又为冷漠的眼睛所视而不见的一切——那象绿

①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т. VI, стр. 317.

② 《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1卷第176页，第205页。

藻一样阻碍我们生活之船前进的、可怕的、令人惊心的渣滓，那充斥在有时悲苦而乏味的人生之路上的冷酷、委琐、平庸之辈的隐私——全部翻腾出来，并挥动那无情的刻刀以雄浑的力量使它浮雕般鲜明地呈现在人人的眼前！这类作家听不到民众的掌声，看不到感激的热泪……伪善、无情的当代评论家会把他的呕心沥血之作判为猥琐、卑下之品，会把他打入污蔑人类的作家之列而使他处在屈辱的地位”。①

那么，他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接受第二种作家的厄运来写《死农奴》呢？

一方面是因为农奴制已成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点。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冯维辛、诺维科夫、拉吉舍夫就对农奴制不断加以抨击和鞭笞。普希金早在1819年在《农村》一诗中就写道：

在一片花的原野和峰峦之间
人类的友人都会悲哀地瞥见
处处是令人窒息的愚昧！
看不到眼泪，听不到呻吟，
命运已把人们抛入无底的深渊；
这儿的地主老爷野蛮无情，无法无天，
他们用强制的皮鞭占据了
农民的劳动、财产和时间，
这儿贫苦的奴隶听命于残酷的地主的使唤，
弯着腰拉着沉重的犁，

① 《死农奴》第1卷第7章。

在无情的鞭答下驯顺地苟延残喘。

从另一方面讲，果戈理对当时俄国社会问题是很关心的。看到祖国大好河山被一小撮农奴主糟踏得贫困荒凉，听到人民在水深火热中呻吟，他不能无动于衷。在《死农奴》第一卷第十一章中写道：“为什么我的耳边总能听到你那飘荡在辽阔国土上的凄婉歌声？在这歌声里蕴涵着什么意义？是什么在召唤，在悲泣，在令人忧心如焚？是一些什么声音痛苦地在耳边回荡，钻到我的心灵深处，在我的心头萦绕？”后来在谈《死农奴》的一封信中他又说：“谁看到这一片片荒凉的、至今尚无人烟的、落寞的旷野而不感到忧伤，谁在我国大地上的凄婉歌声中听不出对他本人——正是对他本人——的痛苦责难，谁要么是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要么就不是一个具有俄罗斯心灵的人。”^①在《死农奴》第一卷第十一章中回答一些假爱国主义者的责难时，他提出：“除了作者，谁还应说神圣的真话呢？”在给谢维辽夫的信中，他说：“相信吧，不管出版什么文艺作品，如果里面没有当前社会关心的问题，那它目前就不会产生影响。”^②“作家同任何人相比，更应该成为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者。”^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果戈理写《死农奴》并不是偶然的。历史、时代、文学传统、家庭影响以及果戈理本人的写作经验和思想认识都为这部不朽作品的出现提供了富饶的土壤，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果戈理生性忧郁、喜爱戏谑的气质和善于洞察人们心灵的天赋才开出了这朵带着含泪微笑的文苑奇葩。

①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 соч.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т. VI, стр. 129

② Н. В. Гоголь,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т. VIII. М., Изд. АН СССР, 1952, стр. 292.

③ Там же, т. VIII, стр. 293.

四

这部小说，果戈理原计划写三卷，实际上只写出了两卷。第一卷开始写于1835年秋，写了三章，然后撂下，着手写《钦差大臣》。1836年秋，《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上演，果戈理受到反动贵族和官僚的疯狂攻击。当时虽有些人在杂志上撰文为他欢呼，但他并未理会，他的好友普希金、维亚捷姆斯基等人的劝慰，也未能使他宽心。在反动分子一片谩骂声中，他深感惶惑，以为是他的同胞都在反对他。于是他就决定到欧洲去游历，以便有机会冷静地思考一下所发生的一切，同时也想找个安静的环境继续写《死农奴》。1836年在瑞士的韦维开始接着写《死农奴》，1839年秋第一卷基本脱稿，然后开始润饰。1841年果戈理携带定稿由国外回到莫斯科。1842年五月第一卷出版。

1840年，还在第一卷进行最后润饰的时候，果戈理就着手写第二卷。写第二卷的时候，正赶上欧洲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俄国国内农民暴动也方兴未艾。由于对革命和农民暴动的不理解，再加上一些观点反动的朋友的影响，果戈理的世界观1843年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陷入了宗教网罗之中。同时由揭露农奴制的立场，转到了维护农奴制的立场。结果于1847年发表了《与友人书简选录》，彻底背叛了原来的进步观点。《死农奴》第二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作者企图在这一卷里塑造一些正面形象为俄国社会指明出路。但是这种做法既不符合当时俄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也违背了他一贯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尽管一再修改，终于未能使他满意。1845年，他把写出的初稿付之一炬。后来又写出了第二稿。第二稿也被他临终前在1852年

全烧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卷五章残篇，是根据清理果戈理遗物时在五个笔记本里发现的草稿整理而成的。

对第二卷五章残稿的写作年代，早年苏联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根据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来判断，目前他们的意见已趋于统一：《最后几章中的一章》成稿较其它四章为早，是1845年烧毁的那部稿子的草稿残篇，其余四章是1848年秋——1849年冬写的，是1852年烧掉的那部稿子的草稿残篇。果戈理在这些残稿上都进行过改动。《最后几章中的一章》改过一次，主要是开头部分划掉了六千多字，重写了六千多字，其它地方划掉了一千多字，增加了近三千字。另四章残稿最初是作者从另外地方誊下来的清稿，后来在行与行之间和空白地方进行过多次改动，每行的修改文字大致形成了五层。这样，修改前的清稿称为早期手稿，后来的修改称为晚期手稿。苏联1959年以前出版的《死农奴》第二卷各种版本都把根据晚期手稿整理出来的文本作为正文，把早期手稿的一些片断作为附录。1959年，苏联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的《Н.В.Гоголь.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果戈理六卷集》）第五卷首次把早期手稿整理出来，作为第二卷的一个新版本同根据晚期手稿整理的旧版本并列刊出。后来，该社1962年出版的《Н.В.Гоголь в двух томах》（《果戈理两卷集》）和1975年出版的《Н.Гоголь. Повести. Пьесы. Мертвые души》（《果戈理，中篇小说·戏剧·〈死农奴〉》）中便只刊印新版本了。这几个文集都注明这个新版本是最完整的（как наиболее полный）。新版本不仅故事情节更完整，思想性艺术性也更高了。旧版本中抽象说教的地方较多，新版本中保留了许多讽刺情节。另外，从文字方面来看，新版本也更为简炼晓畅。本书第二卷是根据新版本译出的，读者如有兴趣，可同收在我的前辈们译本中的旧版本进行比较。

比较《死农奴》各种版本，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学者在校勘整理这部天才作品上所下的功夫很大，而且成就也相当可观。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发现了一些错误是各个版本都没有改正的。这也许是为了“存真”吧。我在译文中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错误都用译者注的形式指出，有的并做了改正。

五

在谈到《死农奴》的写作特点时，果戈理说过：“人们在分析我的某些方面时有许多说法，可是对我的主要特点并没有抓住。这个特点只有普希金一人抓到了。他总是对我说，还没有一个作家有这种才华——能把生活中的庸俗现象显示得这样鲜明，能把庸俗人的庸俗生活这样有力地勾划出来，使一切容易滑过的琐事显著地呈现在大家眼前……这个特点在《死农奴》中表现得更加有力。《死农奴》并不是因为它揭露了俄国的什么伤疤或病痛，也不是因为它描绘了邪恶逞凶、善良受苦这样一些震撼人心的画面而使俄国感到惊恐，在俄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丝毫不是。我的主人公们根本不是恶棍；对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我只须增加一条优点，读者就会容忍他们。可是他们的庸俗加到一起却使读者感到惊恐。”^①用平常事、平常话显示出当时地主和官僚的庸俗生活来，可以说是《死农奴》在艺术上一个特色。这在俄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创举。

正如鲁迅所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②作者在本书中虽然常常使用夸张的手

① Н. В. Гоголь, Собр. соч. в шести томах, т VI, стр. 133.

② 《鲁迅全集》第6卷，1963年版，第258页。

法，但作者并没有离开生活的真实。就象用显微镜向我们显示病菌一样，虽然放大了，但那病菌却实实在在是病菌，并不是假造的什么别的东西。别林斯基说果戈理在现实主义文学上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任何人，决非溢美之词。当时俄国文学界就有许多人认为果戈理继承了普希金的传统，同普希金共同创立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死农奴》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艺术地、真实地显示了庸俗人的庸俗生活，而且在于通过这种生活显示了当时整个俄国社会的弊病。在这部小说里，果戈理通过正面描写奇奇科夫收购死农奴所遇到的一些农奴主和贪官污吏暴露了农奴制社会的黑暗，透露了官逼民反的消息（如科佩金大尉的故事，以及农奴联合起来打死为非作歹的县警官案件等），而且也在字里行间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种种恶习进行了针砭。看了这本书，使人觉得俄国农奴制社会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无法而且也不应该再继续存在下去了。果戈理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俄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无怪乎赫尔岑说：“《死农奴》震动了整个俄国。”^①

《死农奴》还有一个成功之处，那就是它虽然揭露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却不使人感到失望，正象著名俄国作家赫尔岑读完了《死农奴》以后在日记中写的那样，“这是一本奇书，这是对当代俄国的痛心的责难，却不使人感到绝望。透过齷齪的乌烟瘴气能看得见的地方，他看到了一个勇敢的、有力量的民族。”^②我认为这跟作者热爱祖国、相信人民的力量分不开。作者所以要把祖国的种种丑恶现象揭露出来，目的就是要使它变得更美好。一

① Н. В. Гоголь в рус. критике, гос. из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9, стр. 327.

② Там же, стр. 323.

些假爱国主义者对身边的丑恶现象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当有人把这些丑恶现象揭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以爱国主义者的身分跳出来横加指责，大嚷大叫：“把这个公布于世，加以宣扬好吗？这里写的全是我们的事情呀，——这样好吗？外国人会怎么说呢？”果戈理在本书第十一章结尾对这种假爱国主义者进行了抨击，指出他们维护国格是假，维护他们自己才是真。一个作家敢于不顾个人得失安危把妨碍祖国繁荣昌盛的种种丑类揭露出来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作者对祖国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他在第一卷第十一章一段抒情插笔中说：“这片广袤的国土在预示着什么？在你那里怎么会不产生博大精深的思想来呢，因为你自己就是地大物博的呀！在你那里怎么会产生不出勇士来呢，因为你有地方让他们大显身手啊！你的博大胸怀在威严地拥抱着我，在我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影响；我的眼睛被神意照亮了：噢！那是世间还不熟悉的一个多么光辉灿烂的奇妙远方啊！俄罗斯！”作者热爱祖国、歌颂人民智慧、相信祖国未来的激情有时象山洪一般爆发，汇成一段段感人肺腑的抒情插笔。作者笔下的俄罗斯象一辆神奇的三套马车一样风驰电掣地奔向远方，那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同时作者并没有忘记指出，这辆神奇马车的制造者就是聪明、勤劳的俄罗斯人民！

这些话主要是就本书第一卷说的。上文已说过，本书第二卷，作者留给我们的只是草稿残篇，而且作者写这些草稿时世界观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第二卷跟第一卷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有很大不同。

六

上文说过，果戈理写第二卷时，世界观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由揭露农奴制的立场转到了维护农奴制的立场。从草稿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企图在第二卷中塑造一些正面形象为俄国社会指明出路。科斯坦若格洛和瓦西里·普拉托诺夫这两个形象，很明显地是在向农奴主们表明应如何经营庄园，发家致富，穆拉佐夫这个形象则是在教导农奴主们发家致富以后应如何关心国家、有益社会，而总督临去彼得堡之前对下属的演讲则意在教育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这些形象既不符合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违背了作家创作第一卷时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不过，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这些软弱的片断，毫无疑问，在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修改中，可能被作者所改写或毁弃”^①。但是，也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在硕果仅存的这些残稿中，有很多篇页，应当归到果戈理曾经给过我们的最好的篇页中去。”^② 这些最好的篇页，证明这个创作了《钦差大臣》和《死农奴》第一卷的伟大作家虽然作为思想家会误入歧途，但作为艺术家，他始终是忠于自己的。内心的崇高，对真理与幸福的热爱，一直在他的灵魂里燃烧，对于一切卑鄙以及邪恶事物的强烈憎恨，一直到他生命终结都在沸腾着。这些最好的篇页曾受到过许多伟大作家的赞赏，对后来俄国文学的创作也发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例如第一章写的坚捷特尼科夫，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很有典型性，对后来冈察洛夫创作奥勃洛摩夫这个著名形象就产生过很深的影响；第二章里奇奇科夫讲的那个笑话——“要喜欢我们黑不溜秋的样子……”，据大诗人涅克拉索夫说^③，在第二卷尚未出版前，就已风靡全俄；第三章里讲的那个科什卡列夫上校，虽然明显地是在讽刺西欧派，但今

①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

③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и писем. М. 1950, т. 1X, стр. 343-344.